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13  
第 13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ies NO.13

第13辑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年·成都

责任编辑：楼 晓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晓 雨  
责任印制：杨丽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新时期文论与比较文学研究专辑 /  
曹顺庆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4  
ISBN 7-5614-3332-8

I. 中... II. 曹... III. ①文化 - 研究 - 世界 - 文  
集②文学理论 - 文集③比较文学 - 文集 IV. G1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6720 号

###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 (13)

---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四川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13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3 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www.scupress.com.cn](http://www.scupress.com.cn)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

### 学术顾问

季羨林 杨明照 汝 信

李亦园 杜维明 袁行霈

### 主 编

钱中文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 执行副主编

冯宪光 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 组稿人

刘亚丁

李志强

**编委** (以汉语拼音为序)

方 宁 《文艺研究》  
傅道彬 哈尔滨师大  
高 楠 辽宁大学  
龚鹏程 台湾佛光大学  
陈国球 香港科技大学  
黄鸣奋 厦门大学  
蒋述卓 暨南大学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  
南 帆 福建师大  
聂珍钊 《外国文学研究》  
盛 宁 《外国文学评论》  
陶东风 首都师大  
童庆炳 北京师范大学  
王 杰 广西师大  
王 宁 清华大学  
王先霈 华中师大  
王岳川 北京大学  
吴兴明 中外文论学会  
吴予敏 深圳大学  
吴远迈 中外文论学会  
谢天振 《中国比较文学》  
徐岱 浙江大学  
许 明 上海社科院  
阎 嘉 四川大学  
叶舒宪 中国社科院  
尤西林 陕西师大  
曾繁仁 山东大学  
詹福瑞 河北大学  
周 宪 南京大学  
朱立元 复旦大学

# 目 录

## 新时期文论研究

3	“200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钱中文
6	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概说	童庆炳
31	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	冯宪光
54	走向形式—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批评的转型	周新民
65	修辞批评二题	毛宣国

## 比较文学与跨文明研究

79	跨文明研究：把握世界学术基本动向与学术前沿	曹顺庆
88	中西文论互动与文化输出	王岳川
97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余 虹
103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王 宁
108	跨文明传播的不对称性	蒋晓丽 王积龙

##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困惑与进展

- |     |                           |     |
|-----|---------------------------|-----|
| 116 |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 | 曹顺庆 |
| 127 | 拷问：比较文学是什么？比较文学研究特点是什么？   | 孙景尧 |
| 131 | “危机说”的谬误                  | 刘介民 |
| 142 |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            | 刘献彪 |
| 149 | “理论旅行”与“变异学”              | 吴兴明 |
| 160 | 新语境、新思维与新姿态               | 林广泽 |

## 其他

- |     |                                      |                   |
|-----|--------------------------------------|-------------------|
| 175 | 文化研究与政治失忆症<br>——《理论之后》第一章            | 特里·伊格尔顿著 冯文坤译 邹涛校 |
| 189 | 理论之沉浮<br>——《理论之后》第二章                 | 特里·伊格尔顿著 邹涛译 冯文坤校 |
| 198 | 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与问题意识<br>——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会议综述 | 欧阳友权、聂庆璞          |

## 203 编后语

# 新时期文论研究

栏目主持 冯宪光

## 主持人语

任何时期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既往传统的总结和反思。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就走上了一条向现代化道路前进的旅程。其间，走过若干高山低谷、河汊港湾，不经意间就流淌过一个世纪的悠悠岁月。当然，我们还没有走到期望的目的地，我们还在路上行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遥望通向远方的漫漫长途时，吾国吾民都不得不回首前尘往事，回望足迹，思索未来。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有过一段晚清热。许多人把从晚清开始的改良诸端，作为被种种因由压抑而中断的现代化的胚胎而审视，从中总结出中国现代化的各种经验与教训。这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当时，适逢世纪之交，许多学者的研究大体上都以20世纪这100年的学术史作为整体审视对象。从现在所发表的论著来看，晚清民初和“五四”前后这两个时段，研究者甚众。究其原因，大体上也是以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作为过去全部历史指向的目标，把中国20世纪的整体历史发展，定位在向现代化前进这一趋势上。从世纪之初的晚清民初开始，研究中国在从世纪起点向现代化目标进发的起跑线上发生的种种事件、思潮、理论，等等，可以从开端与起源的发生学意义上探讨20世纪的中国问题。

然而，任何历史的开端、任何历史的行走，都会走到今天，而且把路标指向未来。晚清和“五四”的传统，应当研究，同时也应当注意总结或者说目前更应当关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新时期的文化发展的轨迹。因为这是中国向现代化前进的又一个伟大的启航。其间，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表现出科学性、现代性和中国特色这三个明显特征。所谓科学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坚持学科规范的科学精神，坚持对文艺学研究对象的

独特性认识，从科学角度研究和阐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特性，进行自主性的理论研究，提高与完善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水准。所谓现代性，是指文学理论研究必须具有现代学术素养和现代学术品格，即应当在20世纪全球文化现代发展水准和知识背景上，展开文学理论的研究，着重研究和回答现代社会中的文学问题。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在全球化现代文化知识融合的背景下，注重中国文学的本土因素和文学理论民族特性的研究，提倡和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如此，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才有实力，以本土文化的文化身份，去参与全球化的文化对话。这是走向自由、自主和创新的理论探索。这一近30年的历史所积累下来的理论成果，必将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成为又一种新的传统理论资源。

从对知识谱系的溯源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走过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应当反思和回顾。我们因为依然行走在新时期所开辟的新的现代化途中，所以更应当认真总结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走过的道路。为此，本期刊发了2005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单位在长沙召开的“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会议的部分论文，既是给这次会议留下一种纪录，又包含着一种有更多理论家来关注“新时期文学理论”这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的期盼。

# “200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各位领导、代表、同行：

“200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了，我谨代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南大学文学院，向到会的领导、代表、同行，表示热烈的欢迎。

新世纪一晃就快5年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不断在发生新的变化，新的现象不断涌现，问题层出不穷。中外文化领域进行着频繁的交流，开放、多元、多样，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主调。

在这期间，文学艺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像艺术的普及，阅读方式的改变，出现了文学作品的阅读不断减弱的情况，这在国内外好像都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学创作似乎并未中断与萎缩，文学创作的体裁不断在增加，早就出现了电影文学，现在又有了电视文学、网络文学、摄影文学，甚至还出现了手机文学、市民口头创作、通俗歌词创作等，中外各种文学颁奖活动此起彼伏，势头也似乎并未减弱。

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多样化是其主调，出现了各种趋向的写作，有历史写作，世俗写作，个性写作，个人写作，欲望写作，其中特别是后者，显示了从精神滑向平面，削平深度，只求人的身体自然欲望的满足与发泄的倾向。

面对社会、文化、文学中的重大变动情况，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都感到严重的不适应性而进行着反思，古代文学研究是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但文学理论尤其如此。文学理论就学科本身来说，由于其对象的不断变化，在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和易变性，理论范畴的阐释上具有多义性与延展性，在其资源的支持上，不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有着坚实的史料可以依循，而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应当具备在不断变化中使自身获得丰富的品格。当社会文化思想发生变革，在追问学科设置的合理性而形成压力时，文学理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是很自然的了。

文学理论的反思其实 20 多年来并未中断过，只是有时显得张扬造势，有时只是悄无声息的进行着罢了。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理论的反思中，就曾出现过多种文学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它们至今仍在发生影响。近几年来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从学校的文学理论课程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改革的必要，而后提出了文学理论必须走向文化研究的新方案。由于学者们的出发点不同，学术背景的差异，于是引发了一场辩论。从论争本身来看，的确暴露了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严重危机。

文学理论的深刻危机，表现在：一，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脱节方面，例如对于近十几年来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出现的相当部分的文学创作，过去单一性的文学理论思想自然无能为力，即使形成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文学思想，对于新近出现的相当部分作品，确实也不易进行阐释。理论不仅需要描述，还需要审美价值判断。文学理论对于目前的相当部分的创作，确是显得捉襟见肘。对于很有冲击力的网络文学的未来走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要在研究新的文学现象同时，需要寻求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而期待有所突破。二，表现在一些方面我们主要是大力引进，只以外国学者的思想为理论资源，外国的学术思想成了我们的风标。但是模仿照搬，可能使理论成为机械复制。三，表现为顺应现状，迎合平庸，忽视精神的超越，因而弱化了人文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这几个方面，导致我国的当代文学理论缺失了应有的原创性和独创精神。我们需要有对我们自己的文学实践进行阐发的文学理论，一种多样化的文学理论，具有充分学理性的文学理论，以不断扩大文学理论的边界和理论的更新。

其实，在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生机与危机并存。比如，近年来出现了文化诗学、生态文艺学、影视美学、摄影文学论、网络文艺学、超文本诗学，此外还有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即后现代文艺理论著作，就是文学理论的扩容，边界的拓宽，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新的生长点，都丰富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已经出版的很有分量的研究中外文学理论的专题性著作就更多，它们的作者大多是生气勃勃的中青年学者。

就当今发生的文化研究的转向来看，主要转向两个既有联系、又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文化诗学，一是文化研究。有的学者把这两种趋向称作审

美派和文化派，叫法不同，但与文化诗学、文化研究的内涵大体是一致的。进行文化研究，我以为这是非常需要的。现在许多带有一定审美色彩的新的文化现象，不断涌向我们，但其中不少现象并非什么文学，而是泛文化现象和物质建构，需要有人对它们进行及时的阐释，我自己就曾写过这类文章。就论者个人来说，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以及其他门类的研究，可以一身二任或多任，也可以在个人研究中使多种研究方式融会于一体，另成一种自有特色的研究格局。文学理论与泛文化研究可以相互借鉴，互为丰富，因此对个人来说，无所谓界限问题，倒是扩大了个人研究的资源、视野与自由。但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学科，即使是扩容了的文学理论仍是有其自身的界定；而泛文化研究的种种对象汇总一起，如何成为学科，至今还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界限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由于现实文化发展的需要，目前好些高校纷纷在设置文化产业系，那些原来大力主张文化研究的老师，都已转向文化产业的开发，设置课程，编写教材，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已经名正言顺地归了位。

面对这样的情况，召开一次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的研讨会，也许是有益的，即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近 30 年的路程，看看哪些理论有何价值因素，看看外国的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的实际发展情况，以提供一个比较真实的价值参考系数，而不是进行媒体效应的发挥；面对文学创作的新的进展，当前文学理论需要探讨些什么新问题，使其自身真正能够站到学术的前沿，走出困境，实现新的转向与主体创新。这些文学理论中的“国事”，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商议。我阅读了不少学者的文章和新的著作，它们都在思索如何摆脱目前文学理论的现状，并提出了各种意见、改进方案和新的构思，都是十分有益的，给人以启迪。当然，做出更多的实绩，要求于我们的不是几次会议，而是要真正沉潜到学问的求索中去的，会议不过是一种信息交流与推动。

中南大学文学院，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了许多会务筹备工作，为代表们在生活上提供了许多方便。请允许我代表到会的学者、专家，向中南大学文学院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到会指导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2005.10.29

# 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概说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从1978年到现在的近30年中，文学理论虽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这成绩诚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虽然不能说是“辉煌”的，但可以说是“耀眼”的，终于实现文学理论的转型。这“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三种变化也可称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这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依靠文论界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所获得的丰富成果。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它。本文尝试着把这种转型概括为反思期、追求文学理论自主期和多元综合创新期加以概要的描述。

[关键词] 文学理论 新时期 转型 反思

新时期是指从1976年打倒“四人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的一个总称。它是对此前十年“文革”时期一次告别。在十年“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横行，实行极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思想上极端保守和封闭，反映到文艺问题上则把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奉为圣旨，把“文革”以前所产生的作品都说是“封资修”黑货，是“黑线专政”，并一概加以打倒；与此同时用所谓八个“样板戏”统治舞台、出版社。文艺被当成政治的附庸和婢女，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推到极端的境地。“四人帮”的这些做法和说法，实在是走得太远，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最核心内容是：文艺来源于人民群众，文艺属于人民群众。文艺绝不是少数人赚钱的工具，也绝不是少数人篡

夺权力的工具。从 1978 年起，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和其他各界一样进行了反思。终于迎来了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好时期。从 20 世纪初到本世纪初，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好时期有两个，一个是 20 世纪初 20 年，以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早期）为中心的文学理论现代化的草创时期，一个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的文学理论转型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学术话语专业化、学术化，并且都追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从 1978 年到现在的近 30 年中，文学理论虽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这成绩诚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虽然不能说是“辉煌”的，但可以说是“耀眼”的，终于实现文学理论的转型。这“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三种变化也可称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这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依靠文论界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所获得的丰富成果。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它。

下面我试图把这种转型概括为反思期、追求文学理论自主期和多元综合创新期加以概要的描述。

## 一、反思时期（1978—1984）

在新时期开始的时候，文学理论的反思从何开始呢？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从 1957 年开始，中国实行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到了 1962 年，在中苏论战的背景下，在“反修防修”的背景下，毛泽东不但认为国际上阶级斗争没有解决，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很严重，甚至认为党内也有阶级斗争。所以毛泽东提出，“要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对于阶级斗争“从现在讲起，年年讲，月月讲”。<sup>①</sup> 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演变为“文革”的十年。中国现代以来的政治文化具有极强的制约力和渗透力，政治文化改变了，各行各业都要跟着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直接影响到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理所当然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凡是离开阶级斗争的文艺理论都是“反动”的，都在“文艺黑线”之内。因

<sup>①</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251 页。

此，在“文革”结束之后，在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学理论界的“反思”尽管是多方面的，如当时“形象思维”的讨论（针对概念化），“共同美”讨论（针对文艺的阶级性）“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针对单一的政治倾向性）和典型问题的讨论（针对“样板戏”的类型化、脸谱化），尽管也很重要，也解决一些问题，但都还不是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还是要解除文艺对政治的从属关系？文艺是为政治服务呢，还是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呢，还是文艺对于阶级和政治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才是要反思的根本。

### （一）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上海文学》编辑部于1979年第4期以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帮”提出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一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sup>①</sup>文章的作者意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因此提出，“工具说”离开了文艺的特点，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从而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虽然还不敢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不科学，但强调毛泽东的“政治不等于艺术”。应该说《上海文学》这篇文章触及了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从《上海文学》的文章开始，从1979年到1980年，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但由于大家都只找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方面，所以当时的讨论真如“盲人摸象”，交集点很少，当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这个问题的转机是从周扬在1979年11月1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征求意见稿”开始的。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和副院长的邓力群就“征求意见稿”于当年9月8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

<sup>①</sup> 《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sup>①</sup> 这是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内专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但那次文代会周扬的报告并未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然而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sup>②</sup> 随后不久，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sup>③</sup> 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界来说，是在反思中所实现的一次重要的一步，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为文艺的发展、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本身，而在于这真是一次“拨乱反正”。所谓“乱”者，是长期以来，完全把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不平等父子关系。似乎父为子纲、儿子依附于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从属”者，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即依附，附庸之意。所谓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文艺是政治的依附和附庸。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这样来理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分成两部分，即制度的部分和意识形态的部分。意识形态多种多样，政治，法律，哲

<sup>①</sup> 参见《从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一封信谈起》，《人民政协报》2004年10月21日，又见《光明网》2005-1-20。

<sup>②</sup> 《邓小平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

<sup>③</sup> 同上，第108页。

学，历史，宗教，艺术等，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又相互对立。就是说，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历史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分主仆，是平等的，但又相互作用，这里没有父子、主仆之分。这才是“正”。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拨乱反正”。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强调文艺自身的特点，使文艺和文艺理论摆脱了狭窄的约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空间。在这期间，不少理论家发表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如王春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个错误的口号》（《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林焕平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邹贤敏、周勃的《文艺的歧路》（《新文艺论丛》1980年第3期），曹廷华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不科学的命题》（《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等等。

## （二）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

实际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口号，更深的根源在我们是否承认人性、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在于是否承认文艺要表现人性、人情才会有魅力。众所周知，鲁迅批判过人性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批判过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样人性论与人道主义问题就一直成为学术的“禁区”。如果有人重提人情、人性、人道主义这些与文艺问题息息相关的话题，那么就必然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

但是“反思”的声音终于出现，从1978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讨论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达到三四百篇，形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老一代的文艺理论家如朱光潜、周扬、黄药眠、王元化、汝信、钱谷融等都发表了论文，参与这一重要的讨论。为什么这些大家都参与这些问题的讨论呢？我想原因起码有二：第一，在“文革”中，不讲人性、人道的行为达到一个顶峰，大家不但目不忍睹，而且深受其苦；第二，这个问题是比“文艺从属政治”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就文学理论界提出问题主要有：（1）人性、人道主义是什么？（2）人性、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是什么？（3）人性、人道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下面就这三个问题简单评述前边提到的几位大家的观点。

朱光潜的观点。（1）“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力量”就是人性。“据说是相信人性论，就要否定阶级观点，仿佛是自从人有了阶级性，就失去了人性，或者说，人性就不起作用。显而易见，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阶级观点是一种歪曲。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